

经济结构演变的国际经验与基本规律

——兼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田野 倪红福 王文斌

摘要:发达国家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不经历了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合理化的转变过程。考察典型发达经济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贸易结构、人口结构、技术结构的演变特征,总结经济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演变规律,并从经济结构变化视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经验启示。研究发现: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呈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体系日益服务化,消费主导内需结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主体,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等七大规律。现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但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比重较低、服务业发展仍不充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突出、收入差距处于高位、人口负增长和“未富先老”老龄化、本土化自主创新乏力和前沿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构建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夯实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基础;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结构;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4)02-0025-1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最为明显的共性特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1]。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包含经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在经济结构的优化上包括需求、产业、要素投入、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方面结

构的演进。事实上,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就是通过复刻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靠近^[2]。经济结构转换是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中各产业和产业结构发生质变的过程^[3],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对应的经济结构目标^[4]。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是经济发展质态改进的关键因素,经济结构升级提高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研究”(22ZDA063)。

作者简介:田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倪红福(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文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经济效率,而经济效率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经济结构向高级化的演进集中体现了经济体的效率和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5]。

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发展水平。因此,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关于经济结构的研究着眼于描述各组成部门的经济特征和部门间经济联系,探寻经济结构反映的国民经济内在变化规律。国民经济每个部门的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可用来衡量一国(地区)的经济结构^[6]。经济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框架,涵盖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诸多因素,可以用于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6]。产业结构转变可分解为增加值结构、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需求结构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消费和投资结构,这些结构涉及需求、贸易和技术等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6-7]。

当前,运用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翔实而广泛,但从国际层面总结分析经济结构变迁规律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的研究文献不多。基于此,本文考察典型发达经济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贸易结构、人口结构、技术结构的特征,梳理和总结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演变规律,比较分析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结构变化视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经验启示。区别于以制造业比重上升进而实现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为目标^[6],由于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8],本文的比较分析更强调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动规律。

一、经济结构的国际演变规律

人均 GDP 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27 万美元,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为探究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规律,本文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法国、加拿大等九个人均 GDP 在 1 万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作为典型国家,主要总结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贸易结构、人口结构、技术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

(一)增长趋势: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放缓

经济增长前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缺乏足够强劲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现代化不可能成为现实,经济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2]。从典型国家在不同人均 GDP 水平上的 GDP 和人均 GDP 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与 GDP 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伴随着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普遍现象。从典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 GDP 为 1 万美元、2 万美元、3 万美元、4 万美元、5 万美元和 6 万美元时的 GDP 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7.47%、4.27%、2.83%、2.10%、2.04% 和 2.30%,各阶段对应的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 6.45%、3.36%、2.24%、1.47%、1.09% 和 1.59%^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的关键指标之一便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虽然没有明确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具体 GDP 水平,但是我们对分析典型发达国家的 GDP 水平情况,大致能判断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 和人均 GDP 应该进入什么范围以及所需时间。典型国家人均 GDP 从 1 万美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元到2万美元经历的平均时间为13年,其中韩国经历了9年,所用时间最短。典型国家人均GDP从2万美元到3万美元经历的平均时间约为17年,其中美国经历了15年,日本经历了11年,韩国经历了10年。典型国家人均GDP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经历的平均时间约为15年,其中英国和韩国仅经历了10年时间。从人均GDP来看,世界典型发达国家人均GDP每跨越1万美元经历的时间约为15年,具体时间因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经济增长来源和所遭受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异。

(二)产业结构:产业体系高级化,就业结构服务化

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分为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需求驱动的代表理论恩格尔定律认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居民对不同行业的需求弹性不同,因而消费结构会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而变化,导致资本与劳动在行业间重新分配,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化。供给驱动的代表性学说鲍莫尔模型认为,不同行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会导致行业产出相对价格和要素回报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生产要素在行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化。此外,产业结构也受对外贸易的影响,资本和劳动技能的积累会导致一国从事贸易活动时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6]。

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同时趋于高级化,即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差异,发展中国家可通过产业结构转换加快经济发展^[6]。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典型国家“三二一”产业结构特征愈发明显。当典型国家人均GDP在1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5.44%、35.59%、58.97%;当典型国家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2.56%、31.26%、66.18%;当典型国家人均GDP达

到3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1.91%、27.38%、70.71%。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后,第一产业占比趋于稳定,保持在2.00%上下,而二、三产业占比持续分化。典型国家人均GDP从3万美元增长到6万美元时,第二产业占比从27.38%持续下降至19.12%,第三产业占比从70.71%持续上升至79.90%^①。

产业结构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向高级化演进的同时,就业结构也随之向服务业倾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9]。从三次产业就业占比的平均值来看,随人均GDP不断提高,典型发达国家一、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不断上升。当人均GDP为2万美元时,典型国家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均值为10.77%,3万美元时下降至4.67%,4万美元时降至3.46%。典型国家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均值在人均GDP达2万美元时为31.43%,3万美元时为27.59%,4万美元时为23.65%。典型国家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均值在2万美元时为57.80%,3万美元时为67.74%,4万美元时为72.89%^②。总之,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演化特征符合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三)需求结构:消费逐步主导需求结构,消费需求内部结构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

最终需求可分为内需和外需,其中内需是指国内市场中的消费和投资,而外需则是出口到国外的最终需求。产业结构转型与需求结构升级有着密切的联系,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需及时激发和发挥消费需求的动能,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10]。需求结构变迁既会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又会影响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在消费和投资渠道上的相对大小,从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转型^[11]。从典型国家人均GDP为1.5万美元~6万美元时的内

①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需结构来看,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内需中投资占比明显下降,消费占比持续上升,消费在内需中占主导地位。在人均 GDP 达 1.5 万美元左右时,典型国家内需中消费占比的均值为 66.00%左右,投资占比的均值为 34.00%;随后消费占比的平均值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平稳上升,在人均 GDP 为 5 万美元时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接近 80.00%;与之对应,投资占比的平均值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而持续下降,在人均 GDP 为 5 万美元时投资占比的平均值下降至 21.10%^①。以消费拉动为主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

需求结构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解决温饱问题,消费集中于对食品等用于满足生存需求商品的购买;第二个阶段消费转向非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第三个阶段当收入持续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人们的消费支出更多用于安全、社会交往、赢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这些需求更多地由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休闲娱乐等行业提供的服务来满足^[12]。服务消费代表着消费升级的最终趋势,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升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13]。从典型国家不同人均 GDP 水平时消费内需中的服务占比均值变化趋势来看,人均 GDP 在 1.5 万美元时,服务占比为 70.00%;随着人均 GDP 的逐渐上升,服务占比随之提升,人均 GDP 达到 5 万美元后,服务占比达到 86.50%以上^②。随着人均 GDP 的提升,居民消费需求逐渐由物质需求转向服务需求,也将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升级。

(四)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有扩大趋势,再分配政策是主要应对手段

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库兹涅茨的跨国研究。库兹涅茨通过比较 20 世纪前半期部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数据,提出著名的库茨涅茨“倒 U 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14]。此后相关文献对不同国家

或地区的收入结构以及财富分配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并不一致。

从世界整体收入分配结构来看,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曾经出现过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1910 年,全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 1820 年的 0.60 一路攀升到 1910 年的 0.72,而在随后 50 年中,全球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60 年,全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 0.69。第二个高峰出现在 21 世纪初期,2000 年全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回升到 0.72,在最近 20 年中,全球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下降,2020 年的基尼系数降至 0.6 以下^[15]。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资本—劳动报酬分配关系的恶化、技术进步、全球化金融化过程,是过去两个世纪全球收入不平等变动的主要原因^[15-16]。总的来说,政治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往往具有相似的收入不平等变动轨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出现了较大幅度缩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些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平等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从典型国家在不同人均 GDP 水平时的基尼系数(税前和税后)均值变化来看,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典型国家税前基尼系数均值逐步上升。人均 GDP 为 2 万美元时的典型国家税前基尼系数均值为 0.40,而人均 GDP 为 5 万美元时典型国家税前基尼系数均值为 0.49,同比增长 22.5%。税后基尼系数随人均 GDP 的上升幅度小于税前基尼系数。人均 GDP 为 2 万美元时,典型国家税后基尼系数均值为 0.29,人均 GDP 为 5 万美元时典型国家的税后基尼系数均值为 0.35,同比增长 20.69%。人均 GDP 为 2 万美元和 5 万美元时,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均值分别相差 0.11 和 0.14^③。这反映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国家

①②数据来源:WIOD2013、ADB2022 全球投入产出表。

③数据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家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同时再分配政策是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手段,且再分配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

从收入五分组的角度看,全球贫富差距同样巨大。这里将全球收入最高的 20%、次高的 20%、中间的 20%、次低的 20%和最低的 20%人群分别看作高收入户、次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次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以 2021 年不变价计,2010 年高收入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256 207 元,分别是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的 72 倍和 4 倍。2021 年,高收入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297 017 元,年均增长 1.35%,是低收入户的 66 倍、中等偏上收入户的 4 倍^①。2010—2021 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未发生明显改善。值得关注的是,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比收入的不均等差距更大。

(五)贸易结构: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主体,服务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全球化由两种截然不同联结技术的进步驱动: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从蒸汽革命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运输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全球范围商品贸易的发展,这是全球化的第一次分拆;自 1980 年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从根本上降低了信息传输成本,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这是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17]。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其贸易结构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演变而变化。美国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全球价值链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40 年里,美国的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到 27%,高达 40%的美国贸易价值发生在其跨国公司的所有权范围内,主要贸易伙伴逐渐从加拿大、欧盟和日本转变为中国和墨西哥,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子集成电路、机械和其他制品,然而受诸多逆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美国逐渐采取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策略,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分配^[18]。全球价值链总体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重构趋势^[19],北美供

应链、欧盟供应链和亚洲供应链等区域供应链“三足鼎立”格局加速形成^[20]。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今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本质特征^[21]。近 30 年来,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制度和政治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在全球布局,生产过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各自从事生产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通过进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间品进行全球生产,导致了全球乃至一国之内的大量中间品贸易,据统计,全球贸易中近 2/3 属于中间品贸易。

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 WTO 预测,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将由目前的 22%提升至 2040 年的 33%以上。2021 年 12 月 2 日,中国、欧盟、美国、日本等 67 个 WTO 成员共同发表宣言,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决定参加方在 1 年内完成各自正式核准工作。这是自 2015 年以来,陷入困境的 WTO 首次能够就新的全球规则达成一致,这是 24 年来第一套关于服务业的规则,也是国际服务贸易监管规则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成果,将极大改善营商环境,进而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不断增强和扩大该倡议的代表性和多边性。该文件覆盖面广,签署成员覆盖全球 90%的服务贸易。

从典型国家不同人均 GDP 水平下国家出口中的服务占比均值来看,当人均 GDP 达到 2.5 万美元左右时,出口中的服务业占比基本维持在 20.00%上下。从典型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 GDP 与服务业出口占比并不一定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 GDP 的上升并不必然会伴随服务业出口比重上升。一方面,人均 GDP 高的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程度更为明显,尽管服务部门可贸易属性不强,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和商业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服务出口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出口中服务业比重与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后的发展战

^①数据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略存在一定联系。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服务化进程加快,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正常的“去工业化”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效率升级^[22]。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人均 GDP 达到 2.5 万美元~3.0 万美元时,服务业出口占比就已达到 20.00% 以上。然而,对于德国这一工业化国家,其“去工业化”进程缓慢,人均 GDP 在 2.0 万美元~4.5 万美元时,德国第三产业占比虽有增长,但仍未超过 70%,与同期典型国家仍有不小差距,同期出口中的服务业占比维持在 13.00% 上下,远低于其他典型国家。尽管如此,当人均 GDP 达到 5 万美元以后,其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特征更为明显,这推动了出口中的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①。

(六)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

人口结构是指依据自然、地域、社会经济等特征划分成的不同人口的比例结构,在经济学领域中主要关注人口的年龄结构、地域结构与教育结构。通常认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年龄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供应情况,进而从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变化将影响居民消费与储蓄、收入分配等,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23]。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选取了人口增长率、老年人口比重、城镇人口占比、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比较分析主要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的阶段性特征。从人口增长率来看,当人均 GDP 为 1 万美元~4 万美元时,典型国家人口增长率维持在 1% 以下,保持人口基本平衡。从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来看,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后人口老龄化是各国普遍出现的典型特征,呈现人均 GDP 越高老龄化越严重的趋势。典型国家在人均 GDP 达 2 万美元时的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平均为 11.72%,人均 GDP 达 6 万美元时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16.21%。从人口城镇化率来,总体上,随着人均 GDP 增加,人口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如美国在人均 GDP 为 2 万美元、3 万美元和 4 万美元时的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 70.76%、73.68% 和 76.49%。典型国家在人均 GDP 为 6 万美元时的人口城镇化率平均为 82.46%。从人力资本水平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上升。在人均 GDP 达 4 万美元时,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为接近。从不同 GDP 水平下典型国家劳动生产率动态变化来看,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大致呈上升趋势。当人均 GDP 为 3 万美元时,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值为 7.55 万美元,当人均 GDP 为 5 万美元时为 11.19 万美元^②。

(七)技术结构:中间投入结构逐步优化,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特征明显

单位产出中间品投入越少,技术水平越高。增加值率体现的是生产中间品投入的比例,一方面,增加值率也被称为附加值率,与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系数一样,是对技术水平的一种度量^[24],技术水平越高,越少的投入将会带来越多的净产出;另一方面,增加值率也是评价经济发展综合效益的指标,增加值率越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越高^[25]。从典型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均 GDP 达到 1.5 万美元后,增加值率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逐渐提升,从 1.5 万美元时的 46.42% 增长到 6 万美元时的 57.84%,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阶段一般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质量。由于增加值率越高中间品投入越少,因而人均 GDP 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伴随着中间品投入量的减少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中间品投入的组成变化反映了部门内的技术变化。例如,农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制成品投入

①数据来源:WIOD 2013、ADB 2022 全球投入产出表。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使用量增加必然导致机械化程度的提高^[25],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提升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和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26]。典型国家在人均GDP为1.5万美元~2.5万美元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相对较低,仅为20%左右;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后,制造业服务化的水平逐渐增长,维持在35.0%上下^①。同时,在人均GDP较高的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去工业化”到实行“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维持了较高的服务中间品投入份额。因此,制造业服务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趋势。

数字技术重塑了全球生产方式,主要经济体生产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产业化规模为5.7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6.8%;产业数字化规模为32.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8.2%。在产业渗透方面,数字技术率先在第三产业投入应用,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应用仍受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等因素限制,其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2021年全球47个经济体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5.3%、24.3%和8.6%。从整体来看,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国家,数字经济呈现更强的发展韧性。2021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27.6万亿美元,占47个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的50%以上。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在为后发经济体赶超提供机遇的同时,也会给全球产业分工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数字经济同样正在深刻影响需求结构和国际贸易格局。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正在通过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塑造消费方式、提高消费水平等方式促进消费升级。在贸易结构上,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的相关数据,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比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6%。预计到2030年,数字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将

超过75%。由于数字平台同时具备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全球数字服务的出口呈现集中度上升的趋势。数字服务出口排名前10位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仍在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大国新一轮国际贸易领域竞争的焦点。

二、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特征与国际比较

(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但前景依然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1978年中国GDP为1589亿美元,2022年为16.3万亿美元,40余年间中国GDP增长100余倍,年均增速为11.10%;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46%增长到2022年的18.19%。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30%以上,显著高于美国,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受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需求疲软、逆全球化和世纪疫情冲击等不利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近年来中国GDP增长率下降至5%左右,经济发展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否会拖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程呢?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有望实现2035年经济目标。从短期来看,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2%,经济增速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国家之一。从长期历史趋势和国际规律来看,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各国的经济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从典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人均GDP为1万美元至2.5万美元时,人均GDP增速在6.45%至2.66%之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学者们依据不

^①数据来源:WIOD2013、ADB2022全球投入产出表。

同视角的测度来看,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为2.5万美元左右^[27],中国2022年人均GDP已经接近1.3万美元,仍有1.2万美元的差距,未来13年人均GDP如果以4%的平均增速增长,到2035年时人均GDP将达到2.2万美元左右,基本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的经济目标。总之,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明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人力资源优势显著,改革开放红利持续释放,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变,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也没有变^[28]。

(二)中国第三产业占比相对于国际经验较低,吸纳就业的能力不足

中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迈进的趋势明显,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1978—2021年中国第二产业占比从47.71%下降至39.43%,第三产业占比从24.60%上升至53.31%,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2020年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战略路径发生转变,即从高速工业化转向高质量工业化,进而实现全面工业化^[8]。现阶段,中国第三产业占比相较于国际经验更低。典型国家人均GDP在1万美元~2万美元时,第三产业占比的平均值为64.00%左右,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占比为53.31%。典型国家在人均GDP3万美元时,第三产业占比为70.0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进程中,第三产业占比还将继续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将出现明显下降,经济发展的阶段有望迈过完全工业化阶段,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随着产业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不断分离出来,形成了服务性产业,因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会出现结构性下降。以集成电路为例,该产业在发展初期包括了设计、制造、检测、封装,这四个环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统计都列入制造业,但随着技术发展,这四个环节独立成四个产业,其中设计和检测成为服务性产业,而列入制造业统计范围内的只剩下制造和封装。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产业链、供应链处于中低端,且不完整,断点和缺陷较多,工业发展的空间还较大。若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服务业又不能很好地带动经济发展,而是由一些低效率产业替代制造业,将难以发挥制造业的创新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经济高速发展,可能使经济发展面临风险,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短期内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具有重要意义,需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但长期来看,服务业比重提升是必然趋势。

中国产业结构与各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失调。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吸纳就业人数的比重来看,2021年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稳步上升到48.05%,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分别为29.08%和22.87%。从国际经验来看,典型国家人均GDP在1.5万美元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2.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34.02%,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3.48%。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并未呈现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二、三产业就业不足,而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较多。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高,而第一产业占比低,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高有关。从人口城镇化率来看,总体上,随着人均GDP增加,人口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如美国在人均GDP为2万美元、3万美元和4万美元时的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70.76%、73.68%和76.49%。典型国家在人均GDP为1万美元时的人口城镇化率平均为70.55%,而中国在人均GDP为1万美元时的人口城镇化率为60.31%,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仍然相对较低,未来人口城镇化仍是一大趋势,城镇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三)中国内需低消费高投资,但服务消费占比稳步提升

整体而言,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型,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的演变^[29]。从2022年数据来看,主要国家的消费率都在60%以上,中国最终消费率虽然逐年提升,但相较于美国和日本要低15~20个百分点。中国资本形成率高于发达经济体,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韩国、日本较为接近。从数量来看,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基本形成,但是内需中消费和投资的结构相对不合理,失衡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消费偏低而投资偏高。

中国内需中消费占比依次经历快速增长、迅速下降和缓慢增长的阶段。从1995年的59.48%增长到2000年的65.87%,随后急速下降至2009年的50.61%,金融危机之后波动增长到2021年的55.85%。从2000年到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内需的消费占比偏低。这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有关,较高的经济增长往往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匹配^[30]。2000—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超速增长,经济增速持续变大,从8.5%升高到14.2%。然而,金融危机后内需中消费占比提高仍旧不大,这一期间虽经历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改革,但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变。2020年,中国内需中消费占比为56.93%。人均GDP为1.5万美元的典型国家的消费占比平均值为65.97%,人均GDP为2.5万美元的典型国家的消费占比平均值为71.87%。中国内需消费占比与典型国家同期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以扩大消费为政策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消费结构向服务业消费转移,服务消费比重趋于合理,服务消费结构需进一步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消费中的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高,从1995年的44.90%增长到2020年的74.92%。尽管2021年服务消费占比回调到72.65%,但

仍略高于典型国家人均GDP在1.5万美元时70.00%的服务业消费占比平均值。由此可见,中国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相协调,在满足生存消费和耐用品消费后,中国居民消费已经转向服务型消费。然而,服务消费结构仍旧存在改善空间。2020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房地产、居民服务业占生活性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5.72%,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31]。

(四)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高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历经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和低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近十年全国收入差距缓慢缩小三个阶段。城乡与区域间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显著特征。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由升转降的过程。2003—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上升,2008年基尼系数为0.491,随后出现7年的下降。自2016年开始,中国收入差距又出现小幅度反弹,到2019年基尼系数回升到0.465,但始终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低于部分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

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来看,2009—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相较于城镇居民要高1~3个百分点。然而,在2015年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趋于一致。这意味着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趋于下降。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的情况下,全国收入差距难以缩小。2013—2014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比城镇居民高2个百分点以上,而到了2016—2017年,二者收入增长率差别仅为0.5个百分点左右。从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看,未来几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长率的差别将会逐步消失,甚至可能出

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超过农村居民的情况。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普遍偏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城乡收入比在 1.25 以下,且长期遵循倒 U 型的变化趋势,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 2.56,不仅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而且高于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未呈现进一步高于城镇居民的趋势,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仍将进一步持续。此外,目前的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调控的效果有限。在个人所得税层面,中国个税实行的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在个体之间,由于收入来源不同,其所需缴纳的税收额度也不同,不利于群体间收入的合理分配。在间接税层面,间接税一定程度上呈累退性,制约了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

(五)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特征明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较为突出

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作用由升转降。表 1 为中国增加值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及结构。由表 1

可知:第一,金融危机前后,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由强转弱。从出口增加值来看,中国出口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19.22%波动增长到 2007 年的 28.17%,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16.38%。从最终需求的进口增加值比重来看,中国最终需求中进口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7.21%增长到 2004 年的 23.98%,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15.18%。第二,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由强转弱。中间品跨境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体现。前向视角下,出口中间品用于目的国生产自己使用的最终品的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加值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6.29%增长到 2007 年的 9.10%,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4.78%;出口中间品多次跨境的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加值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2.51%增长到 2007 年的 5.74%,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3.13%;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加值出口(GVC 出口)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8.80%增长到 2007 年的 14.84%,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7.91%。后向视角下,简单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

表 1 中国增加值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及结构

年份	前向					后向				
	传统贸易	简单全球价值链	复杂全球价值链	GVC 出口	出口增加值	传统贸易	简单全球价值链	复杂全球价值链	GVC 进口	进口增加值
1995	10.42	6.29	2.51	8.80	19.22	4.86	8.20	4.14	12.35	17.21
1998	8.90	6.06	2.61	8.67	17.57	3.60	6.56	3.24	9.80	13.40
2001	9.00	6.29	3.36	9.65	18.65	4.13	7.90	4.45	12.35	16.48
2004	11.25	8.48	5.05	13.53	24.78	4.42	11.29	8.27	19.56	23.98
2007	13.33	9.10	5.74	14.84	28.17	3.43	10.84	9.21	20.05	23.48
2010	10.52	7.46	4.61	12.08	22.60	3.53	10.19	6.34	16.53	20.06
2013	10.13	6.12	3.61	9.73	19.86	3.49	8.28	5.22	13.51	17.00
2016	9.04	5.87	3.15	9.02	18.07	2.97	6.50	3.72	10.22	13.19
2019	7.77	4.75	3.14	7.89	15.65	5.22	5.87	3.13	9.00	14.23
2021	8.47	4.78	3.13	7.91	16.38	2.65	8.15	4.38	12.53	15.18

注:上述指标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核算框架^[32],利用 WIOD 2011 年版和 ADB MRIO 2022 年版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得到。表 2 的结果同。

表 2 中国增加值贸易的区位结构

年份	前向传统贸易			后向传统贸易		
	欧盟	美日韩	其他经济体	欧盟	美日韩	其他经济体
1995	23.02	54.17	22.81	33.43	42.89	23.68
2001	21.18	55.66	23.17	31.13	41.88	26.99
2007	22.03	40.80	37.18	32.49	41.57	25.94
2012	13.59	30.40	56.00	27.02	32.61	40.36
2018	16.96	32.59	50.45	20.83	24.97	54.20
2021	19.27	30.07	50.66	25.30	31.97	42.72
年份	前向简单全球价值链			后向简单全球价值链		
	欧盟	美日韩	其他经济体	欧盟	美日韩	其他经济体
1995	18.13	43.41	38.46	15.03	42.59	42.38
2001	17.27	41.39	41.35	16.29	35.08	48.63
2007	17.31	35.22	47.47	18.05	30.79	51.16
2012	11.83	21.94	66.23	8.39	17.52	74.09
2018	11.15	26.81	62.04	10.54	18.30	71.17
2021	12.30	22.48	65.22	11.16	21.83	67.01
年份	前向复杂全球价值链			后向复杂全球价值链		
	欧盟	美日韩	其他经济体	欧盟	美日韩	其他经济体
1995	32.51	29.08	38.41	23.53	42.95	33.53
2001	30.30	30.13	39.57	24.21	37.76	38.03
2007	30.67	30.80	38.53	23.44	35.87	40.69
2012	25.44	34.22	40.34	18.53	30.16	51.31
2018	27.30	31.25	41.46	21.55	33.20	45.25
2021	27.71	32.68	39.61	21.94	34.95	43.12

从 1995 年的 8.20% 增长到 2004 年的 11.29%，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8.15%；复杂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从 1995 年的 4.14% 增长到 2007 年的 9.21%，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4.38%；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加值进口 (GVC 进口) 占 GDP 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12.35% 增长到 2007 年的 20.05%，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12.53%。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在减弱，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见表 2)。第一，从传统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来看，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部市场。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去向和最终需求中的增加值来源可分为欧盟、美日韩和其他经济体。从前后

向传统贸易来看，欧盟的比重持续走低，1995—2021 年，前向视角下欧盟占比从 1995 年的 23.02% 下降至 2021 年的 19.27%，后向视角下欧盟占比对应从 33.43% 下降至 25.30%。在此期间，前向和后向视角下美日韩占比也分别从 54.17% 下降至 30.07% 和从 42.89% 下降至 31.97%；前向和后向视角下的其他经济体占比则分别从 22.81% 上升至 50.66% 和从 23.68% 上升至 42.72%。简单和复杂全球价值链中也基本呈现与传统贸易一致的特征，中国增加值贸易的地理结构已经在向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其他经济体重构。第二，无论是从传统贸易来看，还是从全球价值链贸易来看，与发达经济体的增加值贸易占比逐渐下降，变

为低于发展中经济体。1995年其他经济体的前向和后向传统贸易占比分别为22.81%和23.68%，低于欧盟和美日韩，到2021年，这一趋势发生逆转。在前向简单价值链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2021年其他经济体前向和后向简单价值链占比分别为65.22%和67.01%。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这一进程略有迟缓，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尽管其他经济体的后向复杂全球价值链占比从1995年的33.53%增长到2021年的43.12%，但前向复杂全球价值增长缓慢。增加值贸易联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边国家间的价值链联系，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处于向发展中国家的重构中，然而对于需要更多分工的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国与欧盟、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联系依然较强。

中国产业链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安全问题值得关注。当前，中国产业链发展已经取得一些重大成效，中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部分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市场份额、质量、品牌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等事件的冲击，叠加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链供应链变革深入发展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呈现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等发展趋势，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从关键环节来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的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先进工艺、工业软件的“卡脖子”问题严重；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部分领域产品附加值偏低，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从区域布局来看，低端制造企业外流和高端制造业企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及经济稳定的影响不容忽视。

(六)中国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并呈现“未富先老”特征

自2022年起，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老年人

口快速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状况凸显，人口结构失衡风险加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国在人均GDP1万美元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1.47%，而典型发达国家在人均GDP2万美元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平均为11.72%，美国在人均GDP3万美元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1.22%，中国呈现“未富先老”特征。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由人口总量压力进入人口结构性挑战的阶段，面临由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老年人口的照顾赡养、医疗保健，以及劳动力是否充足等问题，成为中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在养老金资源、社会照护体系等方面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造成养老负担加重，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辩证来看，老龄化也会创造一些机会窗口，应该抓住机遇，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七)中国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但本土化自主创新乏力、前沿核心技术依赖进口

研发经费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和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1995—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快速增长，1995年研发经费支出为349亿元，之后的年份呈稳步上升趋势，2019年达2.2万亿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3210亿美元，排

名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研发强度)亦呈快速上升态势,1995 年研发强度仅为 0.57%,2019 年达 2.23%,年均增长率为 6.16%;2014—2019 年连续 6 年超过 2%,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研发经费总量还是研发强度,中国的科技投入均保持强劲增长态势,研发经费总量与美国的差距逐年缩小,投入总量增速保持全球领先。当前中国研发强度已超过欧盟平均 2.1%的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些研发成果,近年来中国专利和论文数快速增长。1995—2019 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和国内专利授权量快速攀升,1995 年国内专利申请量仅 7.0 万件,2019 年增长到 419.5 万件,增长了 58.9 倍;国内专利授权量 1995 年为 4.2 万件,2019 年增长到 247.4 万件,增长了 57.9 倍。

虽然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了一些突出成就,但仍存在不少短板、面临诸多挑战,突出表现为如下方面:综合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07—2010 年中国创新指数排名从第 29 位连续下降至第 43 位,2011 年回升至第 29 位后,2013 年再度下降至第 35 位。尽管 2013 年之后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稳步上升,2019 年提升至第 14 位,但中国创新指数排名与自身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地位并不相称。目前,虽然中国的研发支出在不断上升,但部分核心技术仍然依赖于对基础研究和工业技术应用强国的进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可能阻滞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中国科技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缺芯少核”已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短板。在重大装备、精密仪器、重要材料、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中国技术能力还受制于国外供给。

科技创新需要吸收全人类的科技成果,并通过全球广阔市场提供最大的创新激励。未来中

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中国现代化新征程至关重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以产业结构转变为主要的经济结构转变应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经济结构的国际演变规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结构演变提供了启示。由国际经验可知,在一国工业化的后期,经济增速会明显放缓,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服务业占比将提高并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消费需求在内需中的占比逐渐提高,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主导,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特征日益凸显。现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但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据此,可以得到七方面的启示。

(一)理性认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突破。典型国家在人均 GDP 1.5 万美元时经济增速放缓是普遍现象,一般回落至 5.0% 左右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中国 GDP 增长率为 5.2%,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国际经验基本一致。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要科学合理设定我国未来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目标。考虑到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变化的情况,可将我国“十五五”“十六五”经济增长目标分别设定为 5.0% 和 4.5% 左右。同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多重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二)构建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夯实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基础

构建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发挥服务业在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的支撑作用,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中国服务业占比与典型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服务业发展仍具有较大潜力。现代服务业占主导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33]。从服务业的“功能性分类”来看,可分为提供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满足消费一般性需求的消费性服务业^[34]。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农业、工业、服务业各居其位、各有其用,并将按照产业演进的规律朝着融合化方向发展,现代服务业需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中发挥好支撑保障作用^[35]。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既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题中之义。构建高效服务业新体系,一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养老、医疗、体育、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方向发展,提升居民服务业消费供给质量。二要引导设计、研发、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挥好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新模式。三要深化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创新监管模式,破除产业融合的制度壁垒。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夯实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基础。

(三)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推进消费扩容提质,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发挥消费需求的基础性作用和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其中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供给水平,提升消费层次,使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是以扩大居

民收入为主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改革税收工具,继续实行减税降费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险缴纳负担,发挥好分配制度在提升居民收入中的作用,兼顾公平与效率。二是改善消费结构,培育新消费。当前国内生产和服务难以有效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于特定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因而应加快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36]。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提高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实现供需匹配。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三是鼓励扩大对消费的投资,提升消费供给质量。加大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的建设力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私有市场主体从事生活性服务业,增强市场活力。同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必须采取更大力度贯彻“提低、扩中、调高”的方针。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投资,进一步通过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保障流动

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及其子女在所在地受教育的权利。对高收入人群采取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等措施以遏制财产分布的过度集中。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居民部门与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并进一步加大其就业保障力度,同时完善市场制度和市场监管,取缔可能存在的寻租行为与市场垄断。在再分配环节,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看到,居民财产分配差距对收入分配会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有必要采取有助于缩小财产差距的政策措施。在未来一段时间,居民财产差距的扩大趋势仍会持续,而房产税和遗产税是可以选择的政策手段,也是被许多国家所采用的调节财产差距的通用措施。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角度看,还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21世纪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教育经费与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经费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仍然较大。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要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

(五)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

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应持续参与并寻求主导全球价值链,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技术发展、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模式和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但一些政治和制度因素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去的“超级全球化”不可持续,“慢全球化”成为必然^[37]。第一,迟滞脱钩,深化区域分工,拓展产业空间布局。在中国高科技产业链条遭到美国等国阻击的背景下,仍应不断深化与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分工联系,迟滞脱钩,不断寻求价值链升

级;紧抓重大战略机遇,依托“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共建稳定可靠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重视与拉美、非洲等市场的价值链分工,拓展潜在全球价值链布局空间。第二,扩大开放,主动构建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缩减外资负面清单,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吸引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充分发挥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在构建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现阶段中国工业体系完备,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应推动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主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第三,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建设服务贸易强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凸显,应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加快发展,促使中国更好在全球价值链上抢占优势地位。发挥中国数字经济优势,以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打造数字服务贸易示范区,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最大限度消除服务贸易发展壁垒。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发展。

(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必须深刻认识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要有全局意识,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建立人口、社会、经济等相互衔接协同的政策体系。老龄化往往伴随少子化,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要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优化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树立积极的老龄观,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积极培育银发经济,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七)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我国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赢得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举措^[38]。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简单贴上“低端落后”的标签,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缺少安全保障的产业体系,势必受到各类风险挑战的冲击,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要把维护产业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努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打造有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安全“防火墙”。当前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先进性尚有待提高,累计研发投入规模还不足,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低,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能力和底层技术开发能力欠缺。为此,应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有效投资机制,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建成布局完整、技术先进、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39]。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平

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Reform**

参考文献

- [1]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经济前景与战略任务[J]. 经济研究, 2022(8): 26-39.
- [2] 张文魁. 经济增长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J]. 改革, 2023(6): 1-14.
- [3] 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教程[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4] 刘志彪, 凌永辉. 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 管理世界, 2020(7): 15-29.
- [5] 刘伟, 蔡志洲. 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产业结构升级[J]. 管理世界, 2018(1): 16-24.
- [6] 钱纳里, 鲁宾逊, 塞尔奎因.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吴奇, 王松宝,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5.
- [7] 朱光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77-79.
- [8] 黄群慧. 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J]. 经济学动态, 2021(11): 3-9.
- [9] 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 London: Macmillan, 1940.
- [10] 马晓河.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J]. 宏观经济研究, 2010(11): 3-11.
- [11] 颜色, 郭凯明, 杭静. 需求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J]. 经济研究, 2018(12): 83-96.
- [12] 石奇, 尹敬东, 吕磷. 消费升级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J]. 产业经济研究, 2009(6): 7-12.
- [13] 张颖熙, 夏杰长. 以服务消费引领消费结构升级: 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J]. 北京工商大

-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04-112.
- [14]KUZNETS 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apital formation and financing[M]//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15]CHANCEL L, PIKETTY T.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1820-2020: the persistence and mutation of extre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1, 19(6): 3025-3062.
- [16]李实,陶彦君,詹鹏.全球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2022(4):71-84.
- [17]BALDWIN R.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globalization's second unbundling: How building and joining a supply chain are different and why it matters [M]//Globalization in an age of crisis: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 [18]ALFARO L, CHOR D.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looming "great reallocation"[Z].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3(31661).
- [19]倪红福,田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J].China Economist, 2021(5):72-102.
- [20]倪红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应对思路[J].人民论坛,2023(17):70-77.
- [21]倪红福.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一个逻辑框架[J].经济体制改革,2022(3):5-15.
- [22]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J].中国工业经济,2019(1):5-22.
- [23]倪红福,李善同,何建武.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4(3):63-76.
- [24]夏明,张红霞.跨国生产、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率的变化——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理论解析[J].管理世界,2015(2):32-44.
- [25]沈利生.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怎样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2):82-95.
- [26]祝树金,罗彦,段文静.服务型制造、加成率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J].中国工业经济,2021(4):62-80.
- [27]吕光明,陈欣悦.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J].统计研究,2022(4):3-20.
- [28]倪红福.理性认识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8-15(002).
- [29]倪红福,冀承,杨耀武.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逻辑、趋势研判与政策含义[J].改革,2020(7):82-97.
- [30]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J].管理世界,2010(6):1-7.
- [31]田野,夏杰长.如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增长的关键作用[J].银行家,2023(7):17-20.
- [32]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Z].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7(23222).
- [33]黄汉权,盛朝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演进规律和构建途径[J].中国软科学,2023(10):1-8.
- [34]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2008(1):76-88.
- [35]郑栅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J].中国经贸导刊,2023(8):4-7.
- [36]刘瑞.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国际比较与前景展望[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7):47-59.

- [37]倪红福.从“超级全球化”转向“慢全球化”基本特性[N].经济日报,2023-11-01(011).
[N].北京日报,2023-11-06(014). [39]卢现祥.论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
[38]黄群慧,倪红福.科学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大科学组织模式[J].改革,2023(11):15-27.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Basic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lso on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IAN Ye NI Hong-fu WANG Wen-bin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ll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upgrading and rationalizing their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ly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demand structur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rade structur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ypical developed economies,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law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re will be a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an increasingly service-oriented industrial system, a consumption driven domestic demand structure, an widening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global value chain trade becoming the mainstay, an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population, and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he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service-oriented levels of industries. At present, China has basically achieved industrialization, bu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low consumption proportion,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prominent security issues in the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high income gap,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ing before getting rich, weak localiza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dependence on imports for cutting-edge core technolog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maintain the reasonable growth of economic volume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build a new efficient service industry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 efforts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form a virtuous cycle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achieve mutual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s;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at the center, and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ctively address population aging and maximizing the dynamic role of popul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upported by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structure;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胡江峰)